

論萬曆年間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

何孝榮*

摘要

明朝萬曆年間，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葛寅亮在南京進行佛教改革，清田定租，考選僧官、住持、牒僧等，修拓禪堂，創建公塾，制定請經條例，修復殿堂，釐定佛寺統屬，刻石刊冊，編纂《金陵梵剎志》。這是以南京禮部名義推行的自上而下的佛教改革，在當時規模最大，措施最為詳備。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的原因，除了明朝中期以來南京佛教衰微之外，對佛教的信奉、為官「守職遵制」是其個人的原因，稍早及同時的佛教改革為其提供了借鑒。葛寅亮的改革，使南京佛教得到一定程度的振興，成為全國樣板。葛寅亮因此得罪勢豪權宦，正統的士大夫也不以為然，葛寅亮遭辱罷官，改革失敗，南京佛教日益衰微。萬曆年間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為觀察晚明佛教的一個極好標本。

關鍵詞：萬曆、葛寅亮、南京、佛教改革

* 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員

論萬曆年間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

何孝榮

- 一、前言
- 二、改革內容
- 三、改革特點
- 四、改革原因
- 五、改革成效
- 六、改革結局
- 七、結語

一、前言

中國佛教至唐代鼎盛，宋元以來，日益衰落，逐漸走向生活修行與宗派調和的路線。至明初，太祖、成祖大力提倡和保護佛教，但是又無一例外地加以整頓和限制佛教，抑制其勢力的發展，以維護明王朝統治。¹有明一朝，最高統治者對佛教既提倡和保護，又整頓和限制，這兩方面共同構成明朝佛教政策的主要特點和核心內容。在度僧方面，明初建立了周備的度牒制度，雖然明朝中期以後開始大量鬻牒，但永樂僧額始終是各朝度僧的參照和顧忌，明朝僧人相對數量較少。²明朝不斷瓜分寺田，且加徵賦稅，致使寺院經濟衰微，有明一代基本上寺貧僧窮。明太祖「詔天下沙門講《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命宗泐、如玘等注釋頒行」，³分天下寺院為禪、講、教三類，強令僧人「各承宗派，集眾為寺」，「清其事而成

¹ 參閱何孝榮，〈試論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世界宗教研究》，第 4 期(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19-30；何孝榮，〈明成祖與佛教〉，《佛學研究》，總 11 期(2002)，頁 206-215。

² 參閱何孝榮，〈論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第 1 期(2004)，頁 26-37。

³ 葛寅亮(明)，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刹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卷 2，《欽錄集》，洪武十年丁巳。

其宗」，⁴促進了諸宗進一步融合會通，以及從事祈福弭災、追薦亡靈等各種法事活動的教僧（瑜伽僧、赴應僧）的專業化及其隊伍的壯大。至明朝中期以後，教僧占到整個僧侶總數的將近半數。而且，由於統治者大量鬻牒，僧眾中龍蛇混雜。這些人大多並不真心皈依佛教，也不潛心修學。而統治者為了防止僧俗混淆，禁止僧人游方問道。嘉靖年間，甚至三次下令封閉戒壇，禁止傳戒說法。這樣，寺院教育逐漸廢弛，「末法澆漓，真風墜地」。⁵明朝中期，佛教呈現出「趨向『山林佛教』、『死人佛教』、『經懺佛教』之特質」。⁶如果說元末明初佛教的一些宗派尚能傳承有人，「自宣德以後，隆慶以前，百餘年間，教律淨禪，皆聲聞闕寂」，⁷佛教各宗基本上沉寂不振，佛教進一步衰微。⁸

以南京佛教而言。明初定都南京，太祖、成祖提倡佛教，大量徵召各宗名僧，咨問法要，舉辦法會，編刻大藏經，不斷修建寺院，並對天禧、天界、能仁、靈谷、雞鳴、棲霞等各大寺大量賞賜田地山場，支持和保護其寺院經濟，南京成為當時全國的佛教中心，以八大寺為首的寺院經濟興盛，佛教維持著一定程度的繁盛。明朝中期，首都北遷，南京佛教逐漸失去皇權眷顧和強有力保護，八大寺欽賜土地先後被加徵賦稅，加上佃戶抗糧，寺院經濟陷於困頓。南京佛教各宗，也多沉寂不振。以禪宗而言，所謂「禪道不彰」，「江南法道日漸靡無聞焉」。⁹佛教內部，制度渙散，管理混亂。僧人「各立門戶，梵唄稀聞，觸蠻時競」，「即有數椽僅存遺制，而主者非人，檀施不繼」，¹⁰也逐漸廢圯。因此，明代中期，南京佛教也陷於衰微境地。有鑒於此，嘉靖年間，一些官員和僧人開始在南京提倡佛教，興辦寺學，講經說法，力圖起衰振頹。但是，在當時的全國大環境下，這些改革規模既小，也難以堅持，所以不久即告廢弛，南京佛教衰微至極。

葛寅亮（1570-1646），字水鑒，號杞瞻，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萬曆二

⁴ 釋幻輪（明），《釋氏稽古略續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卷2。

⁵ 釋圓澄（明），《慨古錄》（《卍續藏》本，東京：日本藏經書院，1912）。

⁶ 釋見曄，〈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討〉，《東方宗教研究》，新4期（臺北市：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1994.10），頁67-102。

⁷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13。

⁸ 參閱何孝榮，〈明代佛教政策述論〉，《文史》，第3輯（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頁49-70。

⁹ 釋德清（明），《憨山大師夢游集》（高雄：高雄淨宗學會，1998），卷30，〈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

¹⁰ 葛寅亮（明），〈八大寺重修禪、律堂及瞻田碑記〉，《金陵梵剎志》，卷16，〈鳳山天界寺〉。

十九年（1601）進士，授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遷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¹¹明制，禮部「掌天下禮儀、祭祀、宴饗、貢舉」，祠祭司「分掌諸祀典及天文、國恤、廟諱之事」，「凡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師巫、音樂、僧道人，並籍領之」。¹²做為掌管南直隸祭祀、佛道教等事務的祠祭司長官—郎中，面對其時南京佛教衰微，葛寅亮進行改革，「釐飭僧規，清復賜租，修葺禪宇」。¹³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在當時規模最大，措施最為詳備。其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南京佛教得到一定程度的振興，成為全國的樣板。但葛寅亮因此得罪了勢豪權宦和社會公論，最終遭辱罷官，南京佛教改革遂告失敗。

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無疑為我們觀察晚明佛教發展變遷及衰落提供出一個極好的標本。不過，迄今為止，僅有拙著《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各處對其改革內容有所論述，江燦騰的大作探討晚明憨山德清的曹溪改革，作為背景而附帶提及，¹⁴故而尚無專門的研究。本文擬對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的內容、特點、原因、成效以及結局等加以較為全面而深入地探討，推進明代佛教史的研究。

二、改革內容

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自萬曆三十二年（1604）十二月清查三大寺寺租始，至萬曆三十六年（1608）他「引疾歸里」，¹⁵歷時三年多而止。其改革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清田定租，恢復寺院經濟

明初定都南京，太祖、成祖均崇奉和提倡佛教，對南京天禧、天界、能仁、

¹¹ 佚名（清），〈葛寅亮傳〉、張右民（清），〈葛司農先生傳〉，見葛寅亮（明）撰，吳之淇、王允元（清）編，《葛司農遺集》（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附錄；民國《杭州府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本），卷 124，〈葛寅亮傳〉。參閱何孝榮，〈葛寅亮生平、著述考述〉，收《明代杭州研究》（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下冊，總頁 174-212。按上引三傳記及其它史籍均未載葛寅亮遷郎中的具體時間。查《金陵梵剎志》，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葛寅亮請求「清查欽賜寺租」（卷 50，〈各寺租額條例〉），為署職郎中之最早時間。則葛寅亮遷郎中當在此前或本月。

¹² 張廷玉（清），《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72，〈職官志一〉。

¹³ 葛寅亮（明），《金陵梵剎志》，〈序〉。

¹⁴ 參閱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淨辯之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頁 28-31。

¹⁵ 佚名（清），〈葛寅亮傳〉。

靈谷、雞鳴、棲霞等各大寺共賜有贍僧田近五百頃，「蘆洲亦幾其半」。¹⁶其後，各朝皇帝陸續賞賜，加上前代繼承、官府撥與、檀越施捨、寺僧購買等，南京各佛寺佔有大量公田。根據萬曆年間葛寅亮《金陵梵剎志》統計，南京 180 所稍具規模佛寺中（有 4 所未專門登載入《金陵梵剎志》，而是在介紹其寺田時提及寺名），有公田者 95 所，計 72029 畝。其中，以靈谷、天界、報恩三大寺及棲霞、雞鳴、靜海、能仁、弘覺五次大寺佔有公田最多，達 66270 畝。明初，在皇權嚴格保護下，以八大寺為代表的南京佛寺採用租佃制生產方式，向寺田佃戶徵收高至每畝七、八斗的租額（其時一般官田租額為三至四斗）。太祖規定，各地寺院「欽賜田地稅糧全免，常住田地雖有稅糧，仍免雜派，僧人不許充當差役」¹⁷。南京各大寺「田地洲場皆出欽賜」，¹⁸不納任何賦役，寺院經濟力量強盛。

明朝中期，首都北遷，南京佛教逐漸失去皇權眷顧和強有力保護。其時，明朝財政日絀，不斷加派，八大寺多被徵稅，「稅則由無而有，甚至與民間一則」。¹⁹嘉靖年間，寺田佃戶抗租鬥爭活躍，並獲得地方官府支持，天界寺溧陽莊被迫減租，「每年納米四斗五升」。²⁰天界寺高淳莊佃戶「介恃縣官，敢為違負」，3000 石之租僅剩下 1100 餘石，且「所收類多秕穀」。²¹八大寺稅增租減，難以為繼，寺院衰頹。如，靈谷寺「寺廢僧窮」，「苦無告辯」，「蟻僧不無逃竄」。²²天界寺「租額日漸短少，所入僅足完官，並無顆粒入寺」，寺僧「嘵嘵」。²³

一些勢豪權宦還千方百計地強佔和逼奪各寺公田。如報恩寺放生池淤填，「地土拋荒」，提調太監張潤遂連池地二條一並強佔，「挑挖開墾，召人佃種，歲取租錢」。²⁴能仁寺梅子洲「划場」（即挖土後留下的溝塘），先為誠意伯劉世延府「著家人取去」，²⁵後又為襄城伯李成功府強佔。襄府還派府役、佃戶掘開寺埂，淹沒寺田，並威脅要捆打寺僧、寺佃，逼獻洲田。再如，「積棍」張鏜、張元詔等「希圖謀占」

¹⁶ 葛寅亮（明），〈八大寺定租碑記〉，《金陵梵剎志》，卷 16，〈鳳山天界寺〉。

¹⁷ 《金陵梵剎志》，卷 2，〈欽錄集〉，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¹⁸ 《金陵梵剎志》，凡例。

¹⁹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

²⁰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附〈舊卷·禮部撫院議溧陽莊征租帖文〉。

²¹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附〈新卷·本部移咨撫院行高淳縣議租文〉。

²²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附〈舊卷·秦通判議靈谷寺田不宜加派牒文〉。

²³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附〈新卷·本部移咨撫院行高淳縣議租文〉。

²⁴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附〈新卷·本部查復放生池菜地筭付〉。

²⁵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附〈新卷·本部清還能仁寺劃場埂界告示〉。

原慈相寺田，謊稱寺田為其始祖得自「欽賜」，告至官府，要求「移文取查」。²⁶再如，窯墩庵、法清院公田分別被里長李鶴、生員戎自華等侵佔。²⁷

對南京各寺稅增租減、寺田流失、寺院蕭條，葛寅亮很是不滿。萬曆三十二年（1604）十二月，他「因三大寺田租不明」，遂「照萬曆十一年間本司會同儀制司清查朝天宮事例」，「清查寺租」。²⁸他「博求文卷，旁稽記籍，執籍以問田，執額以問租，畿以內者討佃民而訓之，畿以外者檄邑長而布之」。²⁹接著，他根據各寺莊實際，「查據原額，參以近例，量田肥瘦」，拘集佃戶「會行酌定」，確定租額。其次，葛寅亮清查五次大寺賜產，拘集佃戶，「審定租額」。對被強佔的寺田，多通過司法途徑堅決收復歸寺。清定後的各寺租額，每畝各冬租米一斗五升至四斗不等、夏麥銀三分至七分不等，「大約律以國初原額，則僅及其半而稍溢焉；律以民間常額，則幾及其半而尚縮焉」。³⁰他還制定條約，對寺租徵收、起運、保管等作出詳細規定，保證寺租能夠準時、足額到寺。

這樣，南京各寺尤其是八大寺公田基本清復，「田始有租，租始不逋，雖不能盡如舊額，而亦庶幾十之六、七矣」。³¹如，除去繳納賦稅及田莊盤費，每年靈谷寺得租銀 1199 兩、米 4468 石，天界寺得租銀 582 兩、米 1706 石，報恩寺得租銀 215 兩、米 2067 石，雞鳴寺得租銀 163 兩，能仁寺得租銀 100 兩、米 143 石，棲霞寺得租銀 91 兩、米 544 石，弘覺寺得租銀 32 兩、米 195 石，靜海寺得租銀 52 兩、米 120 石。八大寺銀、米滿倉，寺院經濟迅速恢復。

第二、考選僧官、住持、牒僧等，制定各項僧規條例

明初先後設立善世院、僧錄司，管理佛教事務，僧官均住於南京各寺。³²遷都以後，設南京僧錄司，管轄南直隸佛教。南京僧錄司官員開始比較完備，後不斷裁撤，至萬曆年間，僅存左覺義一員，右覺義三員，分住靈谷寺、天界寺、報

²⁶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附〈新卷·本司查弘覺寺下院田地湖冊帖文〉。

²⁷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公產條例〉。

²⁸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

²⁹ 葛寅亮（明），〈八大寺定租碑記〉。

³⁰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

³¹ 葉向高（明），《蒼霞草》（明末刻本），卷 11，〈金陵各寺定租碑記〉。

³² 參閱何孝榮，〈明初善世院考〉，《西南大學學報》，第 2 期（重慶市：西南大學學報編輯部，2009），頁 46-50。

恩寺、能仁寺。萬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葛寅亮因左覺義「見兼靈谷寺」，「既管衙門印務，總理諸山，再兼本寺，委屬重複」，而能仁寺則「事簡」，因此將能仁寺右覺義調補靈谷寺，左覺義「只專住僧錄司」，「不兼本寺」。³³

僧官（稱官住）原由南京禮部考試佛經選拔，起送禮部具題，吏部覆授。明代中期，僧官考選徒具形式，一些奸僧往往通過所謂保舉，輔以賄賂，買得僧官，「考選典例遂廢沒不舉」。³⁴嘉靖以後，奸僧往往直接插手干預南京禮部「堂考」，「請托終不能禁」。南京禮部遂將考經停止，「改為用鬬」，以致「無賴成風，諸務盡壞」。³⁵官住考選一廢，靈谷、天界、報恩、能仁、雞鳴五寺住持（稱大住持）以及棲霞、弘覺、靜海三寺住持（稱堂筭住持）等的考選也難以進行。而其他眾多的寺院，住持選任也極為混亂，無章可循。

萬曆後期，葛寅亮整頓官住、住持考選制度，廢除用鬬，恢復考經，並定有嚴格程式和制度：

其一，確定住持等名額。明朝南京八大寺的住持，有所謂「大住持」、「堂筭住持」之別。所謂「大住持」，最初由明太祖規定，針對靈谷、天界、天禧、能仁、雞鳴等南京五大寺。據載，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二十六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靈谷、天界、天禧、能仁、雞鳴等寺，系京刹大寺，今後缺大住持，務要叢林中選舉有德行僧人，考試各通本教，方許著他住持，毋得濫舉。欽此。』」³⁶後天禧寺重建為報恩寺，加上其他三所佛寺，形成南京八大寺，為國家寺院，其初始之五大寺住持仍稱「大住持」，由南京禮部考選，起送北京，禮部題請任命；其後補入棲霞、弘覺、靜海三所寺院，住持「系本部堂筭」，即由南京禮部堂札任命，稱「堂筭住持」³⁷。

萬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葛寅亮規定，「大住持八員，靈谷、天界、報恩各二員，雞鳴、能仁各一員」；堂筭住持三員，「其棲霞、弘覺、靜海各一名」。

³³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附〈新卷・本部咨定官住事宜筭付〉。

³⁴ 霍韜（明），《霍文敏公全集》（清同治刻本），卷 9 下，〈南京禮部公行〉。

³⁵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³⁶ 《金陵梵刹志》，卷 2，〈欽錄集〉，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³⁷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其二，分考試為兩考。祠祭司考經，進行第一次篩選：左覺義缺，就右覺義三員內考選二員；右覺義缺，就大住持八員內考選三員；大住持缺，就堂筭住持三員內考選一名，通經僧內考選四名；堂筭住持缺，就通經僧內考選五名。其後，送南京禮部二考，決定去取。考試用《梵網》、《楞嚴》二經出題，由堂官閱卷取補，祠祭司止散卷、收卷，不干預去取，以「潛杜」各僧「希冀之心」。³⁹

其三，限定考試者資格。「官住考補，必由通經僧挨序而進」；官住須「以別寺僧考補，不許即用本寺，以滋偏私」；有犯戒者「不准送試」，「官住有年終記錄簿可查」，「通經僧取官住保結為據」。承恩寺原不在大寺之列，但是寺僧「最善鑽刺」，所以特別規定「不得破例濫收」。⁴⁰

其四，縮短考試、選僧時間。官住缺出，本寺即時申報，祠祭司「即牌行僧錄司，取應考僧名到司」，「定限第一堂考試發案」；「第二堂送南京禮部覆考」，「當日補定」，「隨牌行僧錄司取結」；第三堂，「僧錄司將本僧原住寺一結，申送本[祠祭]司，吏書隨即寫備諮文」，⁴¹限第四堂呈南京禮部給發。

其五，考選後，官住任命程序不變，即仍由南京禮部起送，禮部具題，吏部覆授。大住持則不再起送北京，「止移咨禮部類題」。⁴²

官住、住持之下，設教學僧，負責公塾教學，「須以通經考前列者充之」。靈谷、天界、報恩三大寺各二名，雞鳴、能仁、棲霞、弘覺、靜海五次大寺各一名。各寺還設有通經優給僧，「為考官住及教學而設，務取能作解義、精通經典者」，三大寺各十名，五次大寺各三名。執事僧包括前堂維那僧、管事僧、書記僧、直庫僧、直日僧、殿堂僧等，各有名數不等，「但有誤事及作弊者，俱檄鎖究革。限一年一換。而管事、直庫尤關緊要，更不許戀役」。⁴³

各寺牒僧，萬曆三十五年（1607）六月，葛寅亮也確定額數：三大寺各三百五十名，五次大寺各七十名。凡食糧牒僧，專以本寺度牒為主。牒僧逾於額外，

³⁸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³⁹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⁴⁰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⁴¹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⁴²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⁴³ 《金陵梵刹志》，卷 51，〈各寺公費條例〉。

則照數截住，候缺出頂補。年終，該寺申報，總收一次。如牒多缺少，仍以默經為定。牒僧虧於額內，則扣糧貯庫，待有納牒者，亦年終總收。牒僧又以實在寺焚修為主，如外寺僧已納本寺牒，置房進住者，即准挨缺補糧。本寺牒已出外住，不實在寺者，即除名革糧，取度牒批過給還，不許冒濫。僧分三班，逐日上殿。三次不到，及告假滿三月者，停糧。過一年者，徑革。有故辭糧者，免其上殿。

官住「管轄錢糧、詞訟」，地位重要，祠祭司還要對其考核。考核內容有「征租有無拖欠」、「給眾有無足數」、「公費有無合例」、「焚修有無廢缺」、「戒律有無破毀」等十項。考核形式有年考、總考，年考即每年年終對官住「照武職例考校一次」，遇丙、辛造冊年分總考，「獎多者候缺送考，罰多者革職」。⁴⁴

為了規範和約束僧官、住持、執事以及寺僧，葛寅亮又制定各種僧規條例，包括〈請經條例〉、〈各寺租額條例〉、〈各寺公費條例〉、〈各寺僧規條例〉、〈各寺公產條例〉，對請經刻藏、各寺收支、眾僧選核、焚修事務等作出詳細規定。

對於中、小寺住持選任，葛寅亮也作出規定。中寺住持，「體統與大住持迥別」，遇缺，僧錄司將該寺「有行僧」送祠祭司，「默經考補給劄」。小寺首僧，「又與中寺住持不同」，「徑聽僧錄司選補」。⁴⁵

對違反戒律清規的僧官、住持、僧人，葛寅亮加以懲處。如左覺義如選「受莊僧重賄，違例不行更換」，事發，「懼罪告退，姑免追究」；右覺義仁鏞「違禁借債六百九十兩，俱無的據」，「責令認賠十分之四」，「又擅動查過庫銀，仍加革職」。⁴⁶慈相寺僧性傑、性曉、如山「各分析出賣」寺產，萬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俱逐出」。⁴⁷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新補報恩寺住持明裕到寺畫結，僧海寧、道盛、德華等勒索辱罵。查德華「素行無犯，姑責治釋放」。道盛「因醉酒放肆，追牒還俗」。海寧「慣能賭博，追牒重責枷號」。⁴⁸平時，葛寅亮還巡視各寺，訪察僧風。如萬曆三十五年正月，他親至衡陽寺，得知住持如昇與管事僧興楷、僧真曉通同盜賣寺木，侵匿租糧，又見寺內擺列葷酒，藏匿婦女，遂將興楷、真曉

⁴⁴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⁴⁵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⁴⁶ 《金陵梵刹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

⁴⁷ 《金陵梵刹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附〈新卷·本部筭管絕僧寺產帖文〉。

⁴⁸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附〈新卷·本部究追逼索官住銀錢告示〉。

「追牒逐出」。如昇脫逃，「一面嚴緝，候獲日重加究治」。⁴⁹

第三、修拓禪堂，提倡禪宗

宋元以來，佛教衰微，僅禪宗一線尚存。洪武十五年（1382）五月，針對佛教現狀和民間顯密法事盛行現實，明太祖下令，分天下寺院為禪、講、教三類，要求僧眾分別專業修習。「禪」即禪宗，「講」即宣講佛教經典的僧人，指禪宗以外的其他宗派，主要包括華嚴、天台、法相諸宗，「教」為從事祈福彌災、追薦亡靈等各種法事的僧人（名瑜伽僧或赴應僧）。為了提倡禪宗，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又「命僧錄司行十二布政司，凡有寺院處所，俱建禪堂，安禪集眾」。⁵⁰

但是，禪宗並沒有因為明太祖的提倡而振興，反而是教僧因作法事可收取報酬迅速發展，教寺日增，教僧隊伍不斷壯大，⁵¹「佔到整個僧侶總數的將近半數」。⁵²相對而言，禪宗更加衰微。在南京，禪僧不安於業，「以法為市，禪居無度，奔走世緣」，⁵³禪堂傾圮無存。

葛寅亮認為，禪僧、禪堂是佛教、佛寺的代表，佛教傳承和發展，依靠的是禪僧。他說：「禪堂多系行僧，參學持齋，僧規不失」，「今禪、講僅存於禪堂，而房僧絕不知為何物矣」，⁵⁴「國初撥田贍僧，原為此輩」。⁵⁵因此，清田定租後，葛寅亮決定在除教寺能仁寺以外的七大寺修拓禪堂，「乃就各大剎中剖額租以還禪衲，括羨緡以拓禪居」，「隘者加辟，敝者易新，招提之觀，爛然增色，僧寮各約三、四十楹」。⁵⁶萬曆三十四年（1606）八月，他又將各寺租糧十分之二、三，撥入禪堂供眾。為了保證禪僧安心坐禪，他制定禪堂規條，對其飯食供應、租糧催徵、堂主選補、禪僧焚修等作出具體而詳細規定。

另外，承恩、普惠二寺「居都城水陸之衝，僧近市知價，多廢經、律，禪棲業

⁴⁹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附〈新卷・本部筭管絕僧寺產帖文〉。

⁵⁰ 《金陵梵剎志》，卷 2，〈欽錄集〉，洪武三十年（丙午）[丁丑]。

⁵¹ 參閱陳玉女，〈明代瑜伽教僧的專職化及其經懺活動〉，《新世紀宗教研究》，第 3 卷第 1 期（台北：宗博出版社，2009），頁 39-87。

⁵² 龍池清，〈明代の瑜伽教僧〉，《東方學報》，第 11 冊第 1 期（日本東京：東方文化學院，1940），頁 405-413。

⁵³ 葛寅亮（明），〈八大寺重修禪、律堂及贍田碑記〉，《金陵梵剎志》，卷 16，〈鳳山天界寺〉。

⁵⁴ 《金陵梵剎志》，卷 51，〈各寺公費條例〉附〈本部給各禪堂筭付〉。

⁵⁵ 《金陵梵剎志》，卷 51，〈各寺公費條例〉。

⁵⁶ 葛寅亮（明），〈八大寺重修禪、律堂及贍田碑記〉。

割入僧寮，不可返」。葛寅亮亦增設禪堂，「各於大雄殿後辟十餘楹，以舊賜餼椽金錢，餉諸住錫者，六時稍焚誦其中」。⁵⁷

為了提倡律宗，葛寅亮還在靈谷寺建律堂，並撥出田莊，使收租供眾。

第四、創建公塾，振興寺院教育

明初，南京寺院教育主要還是繼承和延續唐宋以來的講經說法制度。各宗名僧彙集南京，陞座講學，「講演經義，詳注論說」，⁵⁸「居貌提唱，學徒雲集」。⁵⁹明朝中期，佛學不振，僧人窳濫，法師、禪師多疏於佛學，不通文字般若，「經律論置之不問，徒效其師，孫仍其祖，錮習俗為膏肓，日申令猶跳而軼諸外」。⁶⁰

為了挽救佛教頹勢，明朝後期，一些僧俗人士提倡看經、讀經，呼籲禪教一致，改革寺院教育制度。嘉靖年間，南京報恩寺住持永寧先後延請禪僧法會、守愚到寺教習，棲霞寺禮請講僧素庵真節至寺住持。各寺院還陸續開設寺學，教授僧人、行童。但是，各寺當時多「膳脯無資，眾咻易煽，貧者畫而富者怠」，寺學「卒以解散」。⁶¹

清田定租以後，各寺經濟收益大大增加。寺僧向葛寅亮「陳其遺制」，要求恢復設立寺學。萬曆三十五年（1607）三月，葛寅亮遂「仿而復之」，「辟堂之閑敞者為塾」，重設寺學，並制定了一套嚴整的制度：三大寺、五次大寺設公塾。教師稱教學僧，寺大者二人，次者一人，「須以通經考前列者充之」。學僧，三大寺各額定 150 名，五次大寺各額定 30 名。教學內容，「先之律，以嚴其戒，繼之經、論，以示其義，大都責以禪、講，而瑜伽無取也」。⁶²或者具體地說，「學內所習用《梵網》、《楞嚴》等經，不許習應付法事，只圖射利」。⁶³每正月半開學，十二月半止，上、下各半年，以七月為分。教學僧地位較高，俸銀在寺院中僅次於官住、住持；學僧與牒僧一例支取口糧，「牒僧在學，二分兼支」。官住督同教學僧，將實在學僧造花名、假簿，各名下開某年、月、日到學，先後即以到學為序，同日序齒，一

⁵⁷ 葛寅亮（明），〈附記承恩、普惠二寺禪堂略〉，《金陵梵剎志》，卷 16，〈鳳山天界寺〉。

⁵⁸ 喻謙，《新續高僧傳四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 2，〈明臨安淨慈寺沙門釋宗泐傳〉。

⁵⁹ 釋明河（明），《補續高僧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 15，〈如皎傳〉。

⁶⁰ 葛寅亮（明），〈八大寺重設公塾碑記〉，《金陵梵剎志》，卷 16，〈鳳山天界寺〉。

⁶¹ 葛寅亮（明），〈八大寺重設公塾碑記〉。

⁶² 葛寅亮（明），〈八大寺重設公塾碑記〉。

⁶³ 《金陵梵剎志》，卷 51，〈各寺公費條例〉。

樣三本，送祠祭司用印。一本存祠祭司，一本給官住，一本給教學僧。遇有告假及事故，從實填報。假滿一月者，革糧。如有虛冒，教學僧究革，官住罰俸。凡到三大寺、五次大寺納牒僧人，必先經入學，教學僧具結，官住於夏、冬二季類總報祠祭司，方准起送。如未經入學者，不許納牒。

第五、制定請經條例，方便藏經刊刻和流傳

明初，在南京先後編刻出《初刻南藏》、《永樂南藏》兩部大藏經。《初刻南藏》經板先存南京天禧寺，永樂元年（1403）九月，成祖令對來印大藏經者，「合無要他出些施利」。⁶⁴天禧寺毀於火，經板亦焚毀。後成祖重建報恩寺成，《永樂南藏》經板仍存於該寺。各地至南京請刻者不斷，「玄奘之侶翕然南其錫」。⁶⁵報恩寺因有成祖「聖旨」，收取板頭銀，頗以為利。

針對各地來請刻藏經，南京禮部祠祭司曾經定有「甚詳」的請經制度。但制度不十分完善，監督也不得力，所以報恩寺「將書冊廢閣」，「各經鋪俱不照行」。萬曆三十三年（1605）四月，湖廣、四川等地請經僧狀告經鋪「冒濫指勒」，報恩寺「坐視不為稟理」。葛寅亮將涉案經鋪、報恩寺管經僧各加責治，「拘集經鋪」，定立了印經九等的材質、式樣和價格標準。接著，又制定出詳細的請經制度，對請經、刻經等作出嚴格規定，為藏經刊刻和流傳提供便利。⁶⁶

第六、修復殿堂，改善焚修環境

葛寅亮規定，各寺劃撥專門資金，定期修理殿堂。在〈各寺公費條例〉中，立「殿堂焚修」一目：

殿堂逐年揭蓋一次，已有額定銀兩。每年終，查有應修理處，將二季缺僧糧及餘剩銀充用。每五年，遇丙、辛年分大修一次，將官住俸糧、眾僧口糧扣除一半。如有興造工大，即連扣二年亦可。工完，仍復舊額」。⁶⁷

葛寅亮還積極改善寺院焚修環境，限制俗界對佛寺、僧人的干擾、勒索。迴光寺在教坊內，「道所必由」，他「為另辟他途」。又有孔雀、道堂、寶塔諸庵，

⁶⁴ 《金陵梵剎志》，卷2，〈欽錄集〉，永樂元年[癸未]。

⁶⁵ 葛寅亮（明），〈報恩寺九號藏經並藏殿碑記〉，《金陵梵剎志》，卷31，〈聚寶山報恩寺〉。

⁶⁶ 《金陵梵剎志》，卷49，〈南藏目錄〉附〈請經條例〉。

⁶⁷ 《金陵梵剎志》，卷51，〈各寺公費條例〉。

「悉移徙之」，「淨穢於此始別云」。⁶⁸棲霞寺地處南京城東北四十里棲霞山，風景優美，明朝中期以後，逐漸成為士紳騷客樂遊吟詠之處，「夫游必盛騎從，攜朋儔，載芳旨，甚或烹肥擊鮮，酣蕩流湏。乃於僧之寮，方丈之室，遺馥流階，餘脂積澱，不無妨嚴淨而溷毗尼」。葛寅亮在禪堂旁另建清歡堂，「使輜治賓宴」，⁶⁹避免污穢僧寮、方丈。對於衙役勒索，則嚴加禁革。如，此前三大寺補官住，禮部各役及寺僧勒索各不下六、七十金。萬曆三十二年（1604），祠祭司呈報堂官，「嚴行禁革」。但各衙役及寺僧「各不遵行，逼索如故」。三十三年十二月，葛寅亮追查，衙役王臣等各革役枷責，「追還騙去銀錢」。⁷⁰再如，南京禮部官員到寺，寺方設席招待，隨行衙役常「逼令常住添設素菜、麵餅，稱為舊例」，「又謂發銀辦飯，借用什物，亦間有例」。三十三年正月，葛寅亮報請堂官批准，令概禁止，「毋致為清曹之點染也」。⁷¹

第七、釐定佛寺統屬，加強對佛寺的管理

明初，南京佛寺以靈谷、天界、報恩三大寺為首，「就近分統各寺」。明朝中期以後，分統體制空有其名，大、小寺院仍由南京僧錄司統管，「各寺逐月到司具結」。僧錄司統管，既增加了管理難度，也給各寺帶來負擔。有些小寺僅有一、二僧人，甚至遠在幾十里之外，每月也須赴司具結，「不無煩累」。⁷²

葛寅亮對南京佛寺統屬體制加以改革。他將各寺院分為大、次大、中、小幾類，以大寺統次大寺、中寺，次大寺、中寺統小寺，實行三級統屬。統屬的原則仍是「就近」，「如城中相去四、五里內，城外相去十餘里內者，各以中寺領小寺。每月終，各小寺互相具結，送中寺住持，中寺住持於次月朔類總送司」。⁷³這樣，南京寺院的統屬體制就變為小寺對次大寺、中寺負責，次大寺、中寺對大寺負責，大寺由僧錄司「分攝」。⁷⁴當時，計分大寺 3 所，次大寺 5 所，中寺 38 所，小寺 130 所。

⁶⁸ 《金陵梵刹志》，卷 32，〈迴光寺〉。

⁶⁹ 葛寅亮（明），〈攝山棲霞寺清歡堂記〉，陳毅（清），《攝山志》（清乾隆刊本），卷 4，〈建記〉。

⁷⁰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附〈新卷・本部究追逼索官住銀錢告示〉。

⁷¹ 《金陵梵刹志》，卷 51，〈各寺公費條例〉附〈本部會議禁革各役指騙稿〉。

⁷²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⁷³ 《金陵梵刹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⁷⁴ 《金陵梵刹志》，〈凡例〉。

各寺具結內容包括：(1) 不許勾引婦女；(2) 不許安歇奸細；(3) 不許畜養牲口；(4) 不許擺設葷宴；(5) 不許典佃公產；(6) 不許砍伐蔭樹；(7) 不許污穢殿宇；(8) 不許私創庵堂；(9) 不許干預訟事；(10) 不許廢缺焚修；(11) 不許窩藏賭博；(12) 不許容留追牒。每月各寺要「逐項登答」，有違犯者，各該管官住及左、右鄰覺察申稟，而尤以左、右鄰為主。如有縱容不舉，「一體究治」。⁷⁵

萬曆三十五年（1607）二月，南京禮部根據僧錄司建議，又行十家牌法，使「十房互察，有違禁者公同稟究，如容隱事犯，牌內左右鄰房及輪牌直日之家，一體檄鎖追牒」。十家牌法條款與原來具結相同，只是更為詳細、嚴格，如「不許安歇奸細」條加注：「有事在官者尤不得容留」，「不許擺設葷宴」條加注「除官府遣廚外餘人俱禁」，「不許典佃公產」條加注「即有重大緊急公務不得開例」，「不許廢缺焚修」條加注「有公學者尤不得廢業」，「不許容留追牒」條加注「無牒被逐者概不准留」。⁷⁶

這樣，各寺之間既有互相統屬的縱向管理，又有橫向的聯保聯防，形成為縱橫交錯的管理網。

第八、刻石刊冊，匯而成志，鞏固改革成果

對於清田定租成果和制定的各項制度，葛寅亮下令，分別刊刻於石碑和書冊，以便執行和流傳。他「復慮載籍無存，無以徵信將來」，乃編撰《金陵梵剎志》，「為卷共五十有三焉」，⁷⁷著錄南京各寺狀況及其佛教改革成果。

三、改革特點

萬曆年間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有什麼特點？或者說，它在明代後期佛教改革運動中佔到什麼地位呢？

首先，它是由葛寅亮主導的以南京禮部名義推行的自上而下的佛教改革。明朝後期，各地多寺廢僧窮，僧規盡弛，佛教衰微。一些僧俗人士紛紛對佛教現狀

⁷⁵ 《金陵梵剎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

⁷⁶ 《金陵梵剎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附〈十家牌告示〉。

⁷⁷ 《金陵梵剎志》，序。

加以批判，個別人還起而改革。除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以外，當時稍具改革規模者，還有被稱為晚明四大師之一的祿宏在浙江杭州雲棲寺改革，以及德清在廣東韶州曹溪南華寺改革。其中，祿宏的雲棲寺改革，主要是新建佛寺，嚴定規約，弘宗演教，修訂焰口、水陸和課誦等儀軌。⁷⁸德清在曹溪南華寺的改革，包括復寺產、斥僦舍、嚴齋戒、養僧才等。但是，不管是雲棲改革，還是曹溪改革，雖然都得到了官員、士紳大力支持，本質上都是由僧人主導的佛教內部的改革。

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釐飭僧規，清復賜租，修葺禪宇」，⁷⁹各項措施都是他以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身份主導制定、以南京禮部名義推行的。他談清田定租時說：「予攝官承乏，緇羽即吾民，清租亦即吾職，安能忽然為秦越之視？」⁸⁰葉向高也說他：

或有引昌黎之言誚君者，君曰：吾不知其他，知吾職耳。且高皇帝能以天下之大，覆露群生。而不能以區區尺寸之土田，自行其意，是何臣子之敢於倍違也？夫守職遵制，自尋常事，又何譏焉？⁸¹

談到考選僧官、住持、牒僧等，制定各項僧規條例，葛寅亮仍解釋為奉職而行：

或謂是不耕之眾，食之何為？夫高皇帝業已賜之矣。越世小臣，烏號有慕，第不敢委成命於今日耳。其當食與否焉，能排閭閻，叩九天，陟帝左右而問之哉？

82

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得到了南京禮部堂官及各司一些同僚的支持。如三大寺清田定租後，「具呈」掌部事南京工部右侍郎范某，奉批：「查弊定租，詳悉適中，永久可行。俱照行」。討論確定徵租公費事例，呈堂，奉批：「所議綜核之法雖密，體恤之意良多，悉如議行。後之君子留心細玩，不為陰懷偏辭所惑，即永久可無更矣」。⁸³萬曆三十三年（1605）八月，查復能仁寺划場。事成呈報，掌南京禮部事南京吏部侍郎葉向高批曰：

八百畝賜田，二百年舊業，幾付東流，此本部之所不容坐視者也。今修完原掘

⁷⁸ 《補續高僧傳》，卷5，〈雲棲蓮池宏師傳〉。

⁷⁹ 《金陵梵刹志》，〈序〉。

⁸⁰ 葛寅亮（明），〈八大寺定租碑記〉。

⁸¹ 葉向高（明），《蒼霞草》卷11，〈金陵各寺定租碑記〉。

⁸² 葛寅亮（明），〈八大寺贍僧碑小引〉，《金陵梵刹志》，卷16，〈鳳山天界寺〉。

⁸³ 《金陵梵刹志》，卷50，〈各寺租額條例〉。

之圩埂，退還前佔之划場，疆界既明，爭端可杜。……但該司與同事者一片苦心，則後來君子尚其念之，毋以緇流而置度外可也。⁸⁴

後來，葉向高回憶也說：「往公（指葛寅亮，引者注）在留曹典禮，與余共事，一切曹事之廢墜，與先朝之賜田，以贍緇流，而久奪於豪右者，皆悉力復之。余亦竭蹶為公助」。⁸⁵各寺清田定租後，葛寅亮「懇乞勒石」，「具呈」掌部事南京兵部尚書孫某，奉批：「如議，併入碑內」。⁸⁶其他各司同僚，也對葛寅亮改革加以配合。對此，葛寅亮指出：「予愚無似，實仰藉大宗伯主持於上，諸曹長協力於下，而署部少宰葉公、儀司汪君、予司鄭君為力尤多」。⁸⁷祠祭司主事鄭三俊為《金陵梵剎志》作後序，自稱「藉手成事，因宣言於簡」。⁸⁸因此，這場改革是由葛寅亮主導、以南京禮部名義推行的自上而下的佛教改革。

其次，它是當時涉及區域最大、佛寺最多、僧人最眾的佛教改革。如前所述，株宏的佛教改革主要是在雲棲寺內，涉及的是一寺僧眾，即使如所謂「居常數千指」，「及門授戒得度者，不下數千計」，⁸⁹寺僧也不過數百人。德清的曹溪南華寺改革也是在一寺之內，涉及僧眾也不可能超過千人。

葛寅亮的佛教改革，涉及的是南京城內外，包括附郭的上元、江寧二縣各佛寺，有一定規模、記入《金陵梵剎志》者計 176 所，「其最小不入志者」還有百餘所。涉及的寺僧，僅以有統計的三大寺、五次大寺來說。三大寺各定牒僧 350 名、學僧 150 名，靈谷寺禪僧 171 名、律僧 198 名、別院僧 120 名，天界寺禪僧 73 名，報恩寺禪僧 76 名，加上各寺的官住、住持、教學、通經、執事、管莊（洲）等僧，則靈谷寺有僧約 1000 人，天界寺、報恩寺各有僧約 650 人。五次大寺各定牒僧 70 名、學僧 30 名，雞鳴寺禪僧 20 名，棲霞寺禪僧 49 名，弘覺寺禪僧 13 名，靜海寺禪僧 11 名，加上各寺住持、教學、通經、執事、管莊（洲）等僧，則雞鳴寺有僧約 140 人，能仁寺有僧約 120 人，棲霞寺有僧約 170 人，弘覺寺有僧約 130 人，靜海寺有僧約 130 人。合計，八大寺有僧約 3000 人。⁹⁰而加上其他稍

⁸⁴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附〈新卷・本部清還能仁寺劃場埂界告示〉。

⁸⁵ 葉向高（明），《蒼霞餘草》（明末刻本），卷 11，〈憲使貺瞻葛公頌德碑〉。

⁸⁶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

⁸⁷ 葛寅亮（明），〈八大寺定租碑記〉。

⁸⁸ 《金陵梵剎志》，鄭三俊後序。

⁸⁹ 釋德清（明），《憨山大師夢游集》，卷 27，〈雲棲蓮池宏禪師塔銘〉。

⁹⁰ 參閱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 367。

具規模的近 170 所佛寺，以及「最小不入志者」百餘所佛寺，當時南京各佛寺有僧成千上萬當無問題。也就是說，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無論是涉及區域、佛寺、僧人，都是當時最大、最多的。

再次，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是當時措施最為完備周詳的佛教改革。仍以雲棲、曹溪改革為參照。株宏因「教綱減裂，禪道不明」，立志振救。他著《阿彌陀經疏鈔》，「總持圓頓諸經，融會事理，指歸一心」，「一時緇素，歸心淨土，若水赴壑」。令僧眾讀誦《梵網戒經》及比丘諸戒品，著《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疏發隱》，「發明」戒律，以立「基本」。編《禪關策進》，與《高峰語錄》等並刊，「以示參究之訣」。⁹¹他還制定《雲棲規約》，對寺內僧務運作、僧人規範、各種儀式等作出詳細規定。株宏的改革，主要是在雲棲寺內針對僧眾參禪念佛、持戒做法事等制定出一套規約，提倡真修實參，是偏重于「叢林儀軌」的佛教改革。⁹²正如聖嚴法師所總結的，株宏一生共有三大事業，即「提倡律儀生活」、「弘揚淨土法門」、「正視禪法的功能及其實力」，「他是以戒律生活為修行的基礎，以禪法為修行生活的功能，以淨土為修行生活的指歸」。⁹³而德清的曹溪改革，主要內容有十大項，即：（1）「培祖龍以完風氣」，（2）「新祖庭以尊瞻仰」，（3）「選僧行以養人才」，（4）「驅流棍以洗腥穢」，（5）「復產業以安僧眾」，（6）「嚴齋戒以勵清修」，（7）「清租課以裨常住」，（8）「免虛糧以蘇賠累」，（9）「復祖山以杜侵佔」，（10）「開禪堂以固根本」。⁹⁴十項改革囊括修建殿堂、整頓焚修環境、開設寺學、嚴格戒行約束、清田定租、恢復禪堂等內容，確是「周詳」。⁹⁵

葛寅亮南京佛教改革的內容則更為廣泛。從其內容來說，不僅有對佛教內部僧務運作、寺院經濟管理、僧人焚修等的改革，而且包括國家對佛教管理體制的改革，範圍更為廣泛，措施更為完備周詳。作為以南京禮部名義推行的自上而下的佛教改革，其出發點不僅是清除積弊、振興佛教，還包括加強對佛教控制、使

⁹¹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 43，〈明梵村雲棲寺沙門釋株宏傳〉。

⁹² 參閱王公偉，〈叢林儀軌與株宏的叢林改革〉，《宗教學研究》，第 2 期（四川省：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頁 33-39。

⁹³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臺灣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頁 124。

⁹⁴ 釋本昂（明）等，〈曹溪中興錄〉上，釋德清（明），《憨山大師夢游集》，卷 50。

⁹⁵ 參閱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爭辯之研究》，頁 145。

佛教更好地為封建統治服務。後一特點，在葛寅亮南京佛教改革內容中體現尤為明顯。如：他規定，八大寺官住、住持、牒僧等考選均須由南京禮部主持。南京各寺分為大、次大、中、小，實行三級統屬，「互相覺察，每月具結呈遞，又以僧錄司總之」。⁹⁶其後，又以十家牌法取代各寺互結送司。這一套制度，完全是封建政府對世俗社會管理和統治模式的移植，是佛教界自身改革所不可能有的內容。

葛寅亮的清田定租、修拓禪堂、創建公塾、修復殿堂等項改革，由於涉及區域、佛寺、僧人眾多，情況大為複雜，因此都定有詳細的條例、法規，這是雲棲、曹溪改革所無法比擬的。如，曹溪改革的「復產業以安僧眾」、「清租課以裨常住」、「免虛糧以蘇賠累」等，遠不能與葛寅亮的清田定租以及訂立的各寺租額條例、公費條例、公產條例的完整周詳相比。再以曹溪改革的寺學與南京改革的公塾相比。〈曹溪中興錄〉記載：

師至寺之初，即選眾中有通問學、堪為師範者本昂等三人，乃勸合寺僧眾，凡有行童二十已下、八歲已上者，盡行報名到住持，拘集在寺，立三學館，分三教授，教習經典。一年之中，有通二時功課者，乃延請儒師孝廉馮生昌歷、茂才龍生璋、梁生四相教習《四書》，講貫義理。其束修供饋，師自備之。如是三年有成者，乃為披剃為僧，總入禪堂，以習出家規矩，令知修行讀誦、書寫經典，各有執業。……又謂佛法所貴，熏聞成種。嶺南久無佛法熏習，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先教諸得度沙彌，書寫《華嚴》大經，一以法緣廣大，為最勝種子。二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心觀行，以助入道資糧。⁹⁷

其寺學制度顯然與上文論述的南京各寺公塾之完備周詳有較大差距。因此，我們說，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是當時措施最為完備周詳的佛教改革。由此可見，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在晚明佛教改革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四、改革原因

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雖然以南京禮部名義推行，但實際上由他強力主導。可以說，沒有葛寅亮義無反顧的主導推行，也就不會有萬曆年間的南京佛教改革。

⁹⁶ 《金陵梵刹志》，卷 53，〈各寺公產條例〉。

⁹⁷ 釋本昂（明）等，〈曹溪中興錄〉上。

那麼，葛寅亮為何不顧艱難險阻而進行南京佛教改革呢？當然，南京佛教衰微是其直接原因及背景，前言已論及，茲不贅述。這裏，想談談葛寅亮個人的原因以及同時的改革背景。

第一、葛寅亮對佛教的信奉是主要原因

葛寅亮「生秉異姿，嗜古力學」，出仕前「遍閱子、史諸書」。⁹⁸他服膺王守仁及其心學，稱讚王守仁「入室禪宗，開壇儒學，世出世法，幾於一之」，自稱每讀其書，「低徊嚮往，願為執鞭而無從」。⁹⁹他的理學思想以王學為依歸，對「心」、「良知」的解釋與闡發與王學並無二致，並強調「悟」。¹⁰⁰「篤信而死守」程朱的理學家呂留良因此批判他「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注」，¹⁰¹與王畿之說一致，「正是禪悟的傳」。¹⁰²

眾所周知，「近於禪」的王學後學多將良知體認混同於禪門悟境，往往引禪入儒，乃至棄儒逃禪。葛寅亮作為其中一員，對佛教也抱持接納態度。他「讀禪宗語，見其直截痛快，犁然有當於心」。¹⁰³他對佛教勤於佈施。杭州南屏山淨慈寺建永明塔院，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月，他置買柴山五段，共十一畝七分，施捨於塔院。¹⁰⁴祿宏演《圓覺》於淨慈寺，他與會。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他買邵秀蕩六分七厘，擴展該寺放生池，為祿宏八十壽慶。¹⁰⁵而據時人所撰祿宏傳記、塔銘序記載，葛寅亮是祿宏的具戒弟子。¹⁰⁶杭州湖心寺放生池，葛寅亮也是「現宰官身說法，為之護持者」之一。¹⁰⁷萬曆四十八年（1620），他「為母報恩，捨宅建寺」，將南屏山東宅第施捨為「普度親庵」。¹⁰⁸這些雖然多發生在南京佛教改革之後，

⁹⁸ 張右民（清），〈葛司農先生傳〉。

⁹⁹ 葛寅亮（明），《葛司農遺集·王文成公祠記》。

¹⁰⁰ 參閱何孝榮，〈葛寅亮與〈金陵梵剎志〉〉，《南開學報》，第6期（天津市：南開大學學報編輯部，2007），頁114-122。

¹⁰¹ 呂留良（清），《天蓋樓四書語錄》（中國基本古籍庫本），卷14，〈論語上·為政第二·溫故而知新章〉。

¹⁰² 呂留良（清），《四書講義》（中國基本古籍庫本），卷12，〈論語下·子罕第九·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章〉。

¹⁰³ 釋明昱（明），《成唯識論俗詮》（《五續藏》本），葛寅亮序。

¹⁰⁴ 釋大壑（明），《南屏淨慈寺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本），卷9，〈田土〉。

¹⁰⁵ 葛寅亮（明），《葛司農遺集·放生池小疏》。

¹⁰⁶ 參閱荒木見悟，《明代思想研究》（東京：株式會社創文社，1972），頁307。

¹⁰⁷ 金之後（清），《金文通公集》（中國基本古籍庫本），卷8，〈湖心寺重修放生池記〉。

¹⁰⁸ 梁詩正（清），《西湖志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普度親庵〉。

但葛寅亮此前也信奉佛教應該不成問題。

正是因為信奉佛教，所以當葛寅亮面對南京佛教衰微、寺廢僧窮時，他不會無動於衷，而是大力起衰振頹，「往復甚苦」，掀起大規模的佛教改革。試想，如果不信奉佛教，如同時的東林學派，「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恪遵洛閩」，¹⁰⁹倡朱斥王，排佛排道，根本不可能大力進行佛教改革、振興佛教。

第二、葛寅亮為官「守職遵制」是另一重要原因

葛寅亮勤於職守，廉能正直。擔任南京禮部郎中期間，「一切曹事之廢墜」，「皆悉力復之」。¹¹⁰他著意表揚忠良先賢。牛景先為建文時御史，「靖難」之役後逃死。成祖追查，將其次妻罰入教坊，景先後人遂入「樂籍」。萬曆三十三年（1605）九月，葛寅亮查訪得景先五世孫，「給照除名，復姓從良」。¹¹¹黃觀、方孝孺祠隘敝，他加以拓新。南京城內青溪東，原有宋朝時所建先賢祠。後毀。萬曆三十五年，葛寅亮加以重建。¹¹²青溪鷺峰寺後有塘，相傳為唐朝刺史顏真卿所置放生池，歲久湮沒。明代，塘地為太監所佔。葛寅亮「以教坊毀庵隙地易之」，換回塘地，恢復放生池，並構祠「祀[顏]魯公[真卿]」，¹¹³以存忠烈遺址。

其後，他歷官各地。任湖廣提學副使，「藻鑒冰稜，雖撫按台不得以尺一相囑」；所有學租及廩缺餘銀，「發各郡創建書院，並贍文行之優者」。¹¹⁴任福建按察僉事，「廉潔無私，竭力公家，不避勞怨」。¹¹⁵升福建右參議，提督學政，「公明嚴正，品題允當，私竇盡絕」。¹¹⁶他為官清廉。如為九江兵備道數年，「移疾去，行李一肩，蕭然而已」。¹¹⁷在福建僉事任兩年餘，「飲冰茹檠，銜齋蕭然，日酌三山水耳，不以一絲一縷累及民間」。¹¹⁸南明時，他先後仕弘光、隆武政權，堅持抗清。隆

¹⁰⁹ 高廷珍（清）等，《東林書院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卷7，〈顧涇陽行狀〉。

¹¹⁰ 葉向高（明），《蒼霞餘草》，卷1，〈憲使紀瞻葛公頌德碑〉。

¹¹¹ 施沛（明），《南京都察院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本），卷39，〈牛景先傳〉。

¹¹² 乾隆《江南通志》（清乾隆刻本），卷37，〈輿地志·祠墓·江寧府·先賢祠〉。

¹¹³ 《金陵梵刹志》，卷22，〈青溪鷺峰寺〉。

¹¹⁴ 張右民（清），〈葛司農先生傳〉。

¹¹⁵ 董應舉（明），《崇相集》（中國基本古籍庫本），卷2，〈鼓鑄急需切要疏〉。

¹¹⁶ 乾隆《福州府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本），卷46，〈葛寅亮傳〉。

¹¹⁷ 文行遠（清），《潯陽臚醢》（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卷2，〈吏治〉。

¹¹⁸ 葉向高（明），《蒼霞餘草》，卷1，〈憲使紀瞻葛公頌德碑〉。

武政權亡，他絕食而死，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¹¹⁹

可見，葛寅亮一生「守職遵制」，廉能正直。面對南京佛教衰微，他「俯循職司」，¹²⁰加以改革。在進行清田定租等各項佛教改革時，他始終宣稱自己是奉職而為，已見前述。因此，人稱其「日夕循令甲以率其職」，¹²¹進行佛教改革。

第三、稍早及同時的佛教改革為葛寅亮提供了借鑒

如前所述，明代後期，南京及全國各地的僧俗界人士不少人提出了佛教改革主張，一些人還付諸實踐。如，在南京，嘉靖年間，左覺義、報恩寺住持永寧因「江南佛法未大行」，「切以法門為憂」，乃請禪僧法會住三藏殿，「教諸習禪者，始知有禪宗」，又以時任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陸光祖推薦，延致「講演甚明」的高僧守愚，「選僧眾數十人，日開講席，親領聽受，從此始知嚮佛法」。¹²²禪僧法會「憫禪道絕響」，¹²³於嘉靖末年集眾「結坐禪期於天界寺」，人推「中興禪道之祖」。¹²⁴僧真節「深得賢首之印」，主棲霞寺，「眾逾三百，教備五乘，居獅子座，搥大法鼓三十餘年」。¹²⁵這些，對後來葛寅亮倡禪、講，抑教僧不無影響。

再如寺學，僧永寧不僅使出家者習「舉子業」，而且「擇諸孫有學行者」教授《法華》等經。¹²⁶至隆慶元年（1567），報恩寺「奉部檄設義學」，請德清為教師，時「受業行童將一百五十餘人」。¹²⁷其時，不僅是報恩等大寺，連高座等中寺也有寺學之設。¹²⁸葛寅亮的公塾之設，正是「偶寺僧陳其遺制，遂為仿而復之」。¹²⁹

再如，萬曆十五年（1587），南京禮部設立各寺十家牌法。後來推行未果，

¹¹⁹ 參閱何孝榮，〈葛寅亮生平、著述考述〉。

¹²⁰ 葛寅亮（明），〈八大寺定租碑記〉。

¹²¹ 《金陵梵剎志》，〈鄭三俊後序〉。

¹²²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 19，〈明金陵大報恩寺沙門釋永寧傳〉；釋德清（明），《憨山大師夢遊集》，卷 30，〈南京僧錄司左覺義兼大報恩寺住持高祖西林翁大和尚傳〉。

¹²³ 《補續高僧傳》，卷 16，〈雲穀會師傳〉。

¹²⁴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 20，〈明攝山棲霞寺沙門釋法會傳〉。

¹²⁵ 釋如惺（明），《大明高僧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 4，〈南京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

¹²⁶ 釋德清（明），《憨山大師夢遊集》，卷 53，〈自序年譜實錄〉上，嘉靖三十七年、四十一年。

¹²⁷ 釋德清（明），《憨山大師夢遊集》，卷 53，〈自序年譜實錄〉上，隆慶丁卯。按，「受業行童將一百五十餘人」，（明）釋福征，《憨山大師年譜疏》（河北趙縣：虛雲印經功德藏，1994），卷上，隆慶丁卯條作：「受業行童將二百人」。

¹²⁸ 參閱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頁 346-347。

¹²⁹ 葛寅亮（明），〈八大寺重設公塾碑記〉。

至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南京僧錄司申報，葛寅亮遂呈請重加推行。¹³⁰

在浙江，曹洞宗名僧湛然圓澄（1561-1626）著《慨古錄》，以問答形式，總結明朝中期以來的佛教亂象與積弊，並提出一套改革方案。雖然《慨古錄》寫於「丁未季夏之望」即萬曆三十五年（1607）六月十五日，但其思想內容肯定形成於此前。葛寅亮與圓澄無所交往，但對圓澄及其思想有所瞭解。他應請為《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作序，即說：「萬曆、天啟時，兩浙之間，有湛然圓澄大和尚，發大願，起大慈，握大機，轉大用，以匡濟乎末流」，「余敬慕之深且久矣」。¹³¹僧圓澄的佛教批判與改革思想，很有可能為葛寅亮改革所借鑒。

在廣東曹溪，德清稍早於葛寅亮進行佛教改革。我們知道，德清在南京大報恩寺接受了早期教育和訓練，隆慶五年（1571）離開，到北京、山西等地遊方參學，名望益重。因得罪神宗，萬曆二十三年（1595），「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¹³²萬曆二十八年秋，應請入韶州曹溪南華寺，進行各項改革，一年之間，百廢俱興。三十一年，因事牽連，仍遣還雷州。三十四年八月，大赦，再回曹溪，運木修殿。尋為僧誣陷，事白，終辭他往，曹溪改革結束。從內容看，德清的曹溪改革與葛寅亮的南京改革有較多相似處，只是葛寅亮的改革措施更為完備周詳。德清的佛教改革措施當時不可能不四處傳播，葛寅亮很可能受到德清改革影響。總之，改革一定意義上是明朝後期的佛教社會大環境，葛寅亮身處其中，自然會受到影響。

五、改革成效

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自萬曆三十二年（1604）十二月清查三大寺寺租始，至萬曆三十六年他「引疾歸里」止。完備而周詳的改革措施，因其強力推行，暫時基本上都得到落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以清田定租，恢復寺院經濟言。經過葛寅亮的艱苦努力，各寺公田、寺租基本清復。南京八大寺不僅恢復了原有成百上千畝的公田，而且它們的土地收益得

¹³⁰ 《金陵梵剎志》，卷 52，〈各寺僧規條例〉附〈十家牌告示〉。

¹³¹ 釋圓澄（明），《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卮續藏經》本），葛寅亮序。

¹³² 釋德清（明），《憨山大師夢遊集》，卷 54，〈自序年譜實錄〉下，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到了保護，都從其公田中收取到相當可觀的銀、米。明代中期以來「寺廢僧窮」、「蟻僧不無逃竄」、「所入僅足完官」、寺僧「嘵嘵」的狀況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八大寺都銀、米滿倉，經濟實力雄厚，不僅各額定贍僧千人至百人不等，眾僧口糧、日常焚修有了保證，而且官住、教學等僧還有相當豐厚的俸銀，每年各寺院尚有餘銀用於修理圯廢的寺院殿堂，面貌一新。

以考選僧官、住持、牒僧等，制定各項僧規條例言。原先，南京佛寺內部管理混亂、腐敗，僧規盡弛。葛寅亮加以整頓和革新，嚴格僧官、住持、牒僧等的考選，並不厭其煩地制定出多項僧規條例，建立了一整套的佛寺內部規章和管理制度。時人沈德符以親眼所見，記述了葛寅亮改革後的南京各大寺的僧官、住持、各執事的考選情況：

兩京僧人，俱屬祠部。每缺住持，則祠部郎中考其高下，以居首者填補。往游金陵，見三大寺首僧儀從甚都。蓋靈谷、天界、報恩三大刹為最，所領僧幾千人，而棲霞等五寺次之。靈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見示，則皆四股八比，與儒家無異，亦有新詞綺句。其題則出《金剛》、《楞嚴》諸經；其入選者，亦稱祠部郎為座師，呼其同輩為敝寅，堪為破顏。……嘗見天界寺廊廡出示推升諸僧職事，則云：某人升首座，某人升維那諸職，其後著年月用印，一如銓曹文榜。但不知他寺何如耳¹³³。

僧官、住持、執事等考選完全模仿科舉考試，雖「堪為破顏」，但其制度化、專業化卻是不爭事實。嚴整、專業的制度，保證了南京佛教、僧團有效地運作，所謂「興補墮廢，約束僧寮，秩然可觀」，¹³⁴成為全國的樣板。

以創建公塾，振興寺院教育言。經過寺學學習的僧人，其對佛學的瞭解和掌握會更深入、更全面，對改變日益嚴重的僧人素質下滑、佛學不振局面無疑大有裨益。正如葛寅亮所說：

爾時經聲應壑，梵韻飄鐘，濟濟簇簇，日無曠景。行之不輟，習與性成。十誦五戒，如王章國憲枷械切身而不敢犯。三藏九部，如布帛菽粟飲食日用而不能去。以此印性，或借筏而為彼岸之登，或標指而忘真月之視，雖不可知，第就其得與四民各守其業，各居其所，少習長安，不遷異物而相於淫僻。斯不亦有

¹³³ 沈德符（明），《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27，〈釋道・僧家考課〉。

¹³⁴ 朱國禎（明），《湧幢小品》（中國基本古籍庫本），卷28，〈兩京諸寺〉。

禪世法，無點王治哉。¹³⁵

以修拓禪堂，提倡禪宗言，葛寅亮稱「自是法席無虛，鐘梵不輟。賜租非復空靡，而寺僧之聞且見者，庶其有興焉已」。¹³⁶此外，如制定請經條例，方便藏經刊刻和流傳，修復殿堂，改善焚修環境，釐定佛寺統屬，加強對佛寺的管理等，無不有其起衰振頹的作用。

總之，葛寅亮的改革使南京佛教得到一定程度的振興，所謂「其教既用復振」，¹³⁷成為全國的樣板。葛寅亮「留意振刷」，進行改革，「眾譽燁然」。¹³⁸

六、改革結局

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何以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終止？其最終命運如何？葛寅亮改革從清田定租開始，而侵佔寺田尤其是八大寺寺田者多是那些勢豪權宦，清田定租就得與他們作鬥爭。葛寅亮的第一個強大對手是襄城伯李成功。李成功於萬曆十年(1582)襲爵，二十九年七月領南京右府兼操江，位高權重，遠過於葛寅亮。萬曆三十三年四月，能仁寺僧申告襄府強佔划場、淹沒寺田、逼迫投獻。葛寅亮不畏權勢，審理踏勘，由禮部移文襄府，令將肇事役、佃「送部查審」。但過了月餘，襄府也未理會。八月，禮部遣役往拘，僅抓獲佃戶一人。祠祭司審明，要求繼續追拿，並賠償寺院損失。這時，李成功才表示：「僧人告稱本爵佃戶掘埂淹田等情，細查各佃，俱無的據，難以究處」；「今將划場撥還寺僧管業」，「其寺田圩埂壞缺去處，已經行各佃修築，以成兩家和美」。南京禮部不敢過分得罪，只得妥協，表示肇事役、佃「姑暫免究」。¹³⁹至於寺僧田租損失，未再要求賠償。其次是「積棍」張鏜、張元詔。他們買通廬州府指揮同知張勳臣出名，令張霖具稟，稱寺田為其始祖張德勝得自欽賜。萬曆三十四年十月，葛寅亮加以查審，因南京戶科抄錄黃冊，查明張霖等所稟不實，各加責治。¹⁴⁰再如，李鶴、戎自華等

¹³⁵ 葛寅亮(明)，〈八大寺重設公塾碑記〉。

¹³⁶ 葛寅亮(明)，〈八大寺重修禪、律堂及贍田碑記〉。

¹³⁷ 《金陵梵剎志》，鄭三俊後序。

¹³⁸ 董應舉(明)，《崇相集》，卷10，〈答蘇子介書(王子)〉。

¹³⁹ 《金陵梵剎志》，卷50，〈各寺租額條例〉附〈新卷·本部清還能仁寺劃場埂界告示〉。

¹⁴⁰ 《金陵梵剎志》，卷50，〈各寺租額條例〉附〈新卷·本司查弘覺寺下院田地湖冊帖文〉。

「刁惡怙終，難以理喻」，拒絕退還寺田，終被「參送法司」，「斷田歸該寺」。¹⁴¹眼見葛寅亮動真格，萬曆三十五年四月，佔據報恩寺池地的太監遂「將前項池、地、房屋退入本寺」。¹⁴²可以說，清田定租取得了勝利，葛寅亮卻得罪了強佔謀吞寺田的勢豪權宦。

清田定租著力恢復寺院經濟，也逼使佃戶增加了租額負擔。明朝中期，一方面是地方官府加徵賦稅，另一方面是佃戶們不斷抗租，並得到地方官員主要是府縣官員的支持，南京八大寺被迫減租，有的甚至收不上租。葛寅亮採取強制手段，清查三大寺欽賜田地以及額租、賦稅。對於租額，他原來「欲直復國初之例，據各佃苦苦哀告，情難盡拂」，遂「相應查據原額，參以近例，量田肥瘦」，並拘集佃戶「會行酌定」。¹⁴³對五次大寺，葛寅亮也是拘集佃戶，「審定租額」，「各取佃戶認狀」。¹⁴⁴而天界寺高淳莊租額及徵收方式，葛寅亮及南京禮部與佃戶、府縣經過反復鬥爭，最後各自讓步妥協，才使問題得以解決。因此，清田定租在一定意義上說是薄民眾而厚僧人，損百姓而益縑流，朘削「吾民」而優養「異端」，得不到佃戶、地方官的支持，正統的士大夫也不以為然。

南京佛教改革為葛寅亮遭辱罷官埋下伏筆。本來，在清田定租時，葛寅亮就預感「勢重伏禍，事瑣無名」。¹⁴⁵但他全然不顧，強力推行佛教改革。時人記載，「亡何，葛寅亮為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投劾歸」。¹⁴⁶另一時人也記載，葛寅亮「以寺田見齮於士夫，陰鼓諸生，煽揭動搖，同事避匿畏縮，甚且有回舌取媚於士夫者」。¹⁴⁷可見，葛寅亮因清田定租得罪勢豪權宦，他們慫恿諸生誣辱葛寅亮，同事無為其辯護者，甚至附和攻擊，葛寅亮被迫引疾辭官。其後，繼任者廢止改革，反其道而行之：「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所為，今已蕩然矣」，¹⁴⁸南京佛教改革遂告失敗。

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歷時僅三年，時間短暫，因此未培養出有代表性的佛

¹⁴¹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公產條例〉。

¹⁴²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條約〉附〈新卷·本部查複放生池菜地筭付〉。

¹⁴³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

¹⁴⁴ 《金陵梵剎志》，卷 50，〈各寺租額條例〉。

¹⁴⁵ 葛寅亮（明），〈八大寺定租碑記〉。

¹⁴⁶ 朱國禎（明），《湧幢小品》，卷 28，〈兩京諸寺〉。

¹⁴⁷ 董應舉（明），《崇相集》，卷 10，〈答蘇子介書（王子）〉。

¹⁴⁸ 朱國禎（明），《湧幢小品》，卷 28，〈兩京諸寺〉。

門人物，也未在佛教內部留下其他可觀成就。明末以後，佛教界對之均無提及或表彰。清代南京的諸種佛寺志，如陳毅《攝山志》、謝元福《靈谷禪林志》也都沒有相關記載。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一直為佛教界所忽視。

葛寅亮此後數仕數歸，除在天啟七年（1627）出任南京尚寶司卿時，為《金陵梵剎志》作序、刊行外，在其他官職任上，也再未推行佛教改革。對於這次佛教改革的結局，後來他只是說：「予輯《金陵梵剎志》甫成，適請告去」。¹⁴⁹到了清朝，弟子為葛寅亮編文集，張右民等撰寫詳細傳記二篇，¹⁵⁰對此事也絕口不提。葛寅亮及其弟子都有意回避，是他由此罷官而遭受仕途第一次挫折，抑或改革本身不符合社會公論？我們不得而知。這次改革遂湮沒無聞。

七、結語


如前所述，明朝中期以來，南京佛教衰微，作為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的葛寅亮起而改革。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自萬曆三十二年（1604）十二月清查三大寺寺租始，至萬曆三十六年他「引疾歸里」，歷時三年多而止。其改革內容，包括清田定租，恢復寺院經濟；考選僧官、住持、牒僧等，制定各項僧規條例；修拓禪堂，提倡禪宗；創建公塾，振興寺院教育；制定請經條例，方便藏經刊刻和流傳；修復殿堂，改善焚修環境；釐定佛寺統屬，加強對佛寺的管理；刻石刊冊，匯而成志，鞏固改革成果等方面。這場佛教改革，是由葛寅亮主導的以南京禮部名義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當時涉及區域最大、佛寺最多、僧人最眾的佛教改革，也是當時措施最為完備周詳的佛教改革，因此在晚明佛教改革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由他義無反顧的主導推行。從其個人原因來分析，對佛教的信奉是主要原因，為官「守職遵制」是另一重要原因。另外，稍早及同時的佛教改革為葛寅亮提供了借鑒。這次改革，因葛寅亮強力推行，各項措施暫時基本上都得到落實，南京佛教得到一定程度的振興，成為全國的樣板。但是，清田定租等也得罪了強佔謀吞寺田的勢豪權宦，正統的士大夫也不以為然。葛寅

¹⁴⁹ 《金陵梵剎志》，〈序〉。

¹⁵⁰ 佚名（清），〈葛寅亮傳〉、張右民（清），〈葛司農先生傳〉。

亮因此遭辱罷官，措施盡廢，改革終告失敗。明清以來，這次改革也為南京佛教界乃至葛寅亮自己及其門人所忽視與避談，遂湮沒無聞。

萬曆年間葛寅亮南京佛教改革的失敗，正如江燦騰評論德清曹溪改革失敗而言：「晚明佛教大環境的變化，很難靠個人主觀意願而改變」。¹⁵¹其後，南京佛教也隨著全國佛教又步入衰微，進一步陷入「山林佛教」、「死人佛教」、「經懺佛教」的形態，無法振作。因此，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無疑為我們觀察晚明佛教發展變遷及衰落提供出一個極好的標本。我們今天書寫晚明佛教改革、復興史，應該有葛寅亮專章。

¹⁵¹ 江燦騰，〈晚明佛教改革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154。

參考書目

史料

- 朱國禎（明），《湧幢小品》，中國基本古籍庫本。
- 沈德符（明），《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施沛（明），《南京都察院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本。
- 葉向高（明），《蒼霞草、餘草》，明末刻本。
- 葛寅亮（明），（清）吳之淇、王允元編，《葛司農遺集》不分卷，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
- 葛寅亮（明），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剎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 董應舉（明），《崇相集》，中國基本古籍庫本。
- 霍韜（明），《霍文敏公全集》，清同治刻本。
- 釋大壑（明），《南屏淨慈寺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本。
- 釋如惺（明），《大明高僧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釋明河（明），《補續高僧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釋明昱（明），《成唯識論俗詮》，《卮續藏》本。
- 釋圓澄（明），《慨古錄》，《卮續藏》本，東京：日本藏經書院，1912。
- 釋圓澄（明），《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卮續藏》本。
- 釋福征（明），《憨山大師年譜疏》，河北省趙縣：虛雲印經功德藏，1994。
- 釋德清（明），《憨山大師夢遊集》，高雄：高雄淨宗學會，1998。
- 文行遠（清），《潯陽踰醢》，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 呂留良（清），《天蓋樓四書語錄》，中國基本古籍庫本。
- 呂留良（清），《四書講義》，中國基本古籍庫本。
- 金之俊（清），《金文通公集》，中國基本古籍庫本。
- 高廷珍（清）等，《東林書院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 張廷玉（清），《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梁詩正（清），《西湖志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陳毅（清），《攝山志》，清乾隆刊本。
- 《杭州府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本。

乾隆《江南通志》，清乾隆刻本。

乾隆《福州府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本。

喻謙，《新續高僧傳四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專書

江燦騰，《晚明佛教改革史》，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爭辯之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

江燦騰，《曹溪之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

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南炳文、何孝榮，《明代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荒木見悟，《明代思想研究》，東京：株式會社創文社，1972。

張聖嚴，《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特以智旭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5。

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臺北：如聞出版社，2001。

釋見曄，《明末佛教發展之研究——以晚明四大師為中心》，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釋果祥，《紫柏大師研究——以生平為中心》，臺北：東初出版社，1990。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期刊論文

王公偉，〈叢林儀軌與祿宏的叢林改革〉，《宗教學研究》2002年第2期，成都：四川大學，頁33-39。

何孝榮，〈明代佛教政策述論〉，《文史》2004年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頁49-70。

何孝榮，〈明成祖與佛教〉，《佛學研究》2002年總11期，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頁206-215。

何孝榮，〈明初善世院考〉，《西南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重慶：西南大學，頁46-50。

何孝榮，〈葛寅亮生平、著述考述〉，《明代杭州研究》下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頁174-212。

何孝榮，〈葛寅亮與〈金陵梵剎志〉〉，《南開學報》2007年第6期，天津：南開大學，頁114-122。

何孝榮，〈試論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頁19-30。

何孝榮，〈論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頁26-37。

陳玉女，〈明代瑜伽教僧的專職化及其經懺活動〉，《新世紀宗教研究》2009年第三卷第1期，臺北：宗博出版社，頁39-87。

陳玉女，〈明萬曆時期慈聖皇太后的崇佛〉，《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二十三號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1997年12月，頁195-246。

龍池清（日本），〈明代の瑜伽教僧〉，《東方學報》第11冊第1期，日本東京：東方文化學院，1940，頁405-413。

Study on Ge Yinliang's Reform on Buddhism in Nanjing During Wanli years

He, Xiao-Rong^{*}

Abstract

During Wanli years in Ming Dynasty, Ge Yinliang, an official of libu in Nanjing, had carried a most large-scale and widespread reform on Buddhism in Nanjing. To certain degree Buddhism in Nanjing had been promoted and became the model around the country.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Ge Yinliang's reform, including its content, features, causes, consequence and outcomes, hoping to improve study of the Buddhism history in Ming Dynasty.

Keywords: Wanli years , Ge Yinliang, Nanjing, Reform on Buddhism

^{*} Fellow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